

吸取西方经济学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论述

傅 殷 才

本文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邓小平同志阐明了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怎样作到既大胆又恰当地利用西方经济学成果,以深化改革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等重大理论问题。文章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论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理论”与“实际的专门研究”、批判与借鉴、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成果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视察我国南方时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其中包括吸取西方经济学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些理论,能使我们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大胆地吸取和借鉴它,善于利用它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捍卫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呢?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如何大胆地结合我国实际来借鉴和利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①这种关于“两手政策”的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指明了方向。他一方面提醒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对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②,这是要不得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要大胆地、坚决地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③。

邓小平同志这种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态度，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每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是非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吸收和改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获得的成就。大家知道，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列宁把西方经济学区分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实际的专门研究”。他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指资产阶级学者——引者注）所获得的成就”。并且特别指出，“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加以利用，就不能前进一步。”④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注意改造和利用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例如，列宁一方面指出“泰罗制”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又强调它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重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⑤。他认为必须在社会主义的俄国加以研究和推广，藉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这种二重性的论述，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连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加以注意。近一二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强调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和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的区别和对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过，他们企图以此来诋毁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罢了。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其考虑不考虑社会价值判断问题，即考虑不考虑社会的是、非、好、坏、当、否等问题。所谓规范经济学，就是根据个人的价值观为经济社会提供规范。规范经济是有价值判断的，以价值判断为基础进行分析，处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到全社会的经济制度，也可以小到日常生活问题，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是好还是坏？西方经济学说是真理还是谬误？就存在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所谓实证经济学，这是客观地、科学地解释经济社会的运行。它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着眼于经济事物之间和各种变量关系的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这种区分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资本论》的“错误”就在于它的规范性，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论证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而他们的经济学似乎是实证经济学，是科学的。显然，这种观点是很错误的。实际上，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前提条件，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十分明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社会判断标准，不过故意装得公允而已。

我们不应当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实际的专门研究”、“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总是把上述二者合一的，既有实际，也有理论。但是，把二者加以区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也认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某些重叠是难免的。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很明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几乎不能区分，但是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检验哪些属于实证经济学，哪些属于规范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⑥

把当代西方经济学明确区分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实际的专门研究”，在对待西

方经济学问题上可以防止两方面的错误：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庸俗而又反动的时候，就全盘否定，绝对排斥；当面临西方经济学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取得了某些成就的时候，就照抄照搬，顶礼膜拜。

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政策”思想，既包含着这种明确的区分，又告诉了我们对待这两方面的策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在改革开放时期研究和利用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习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早在1978年就明确地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⑦他在南方巡视期间又强调指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些思想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理论，多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加强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已经历了批判、评介和借鉴的过程。目前，关于这些问题仿佛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实际上，正确处理批判与借鉴的关系是不容易的。我们认为，一方面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远没有作深入的、实事求是的评议，另一方面，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的借鉴和利用，可以说还只是刚刚起步，而且遇到了各方面的阻力，如一引进和利用西方国家的某些科学管理方法，就可能被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邓小平同志不无根据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说明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需要有多么大的胆量！

的确，要在西方经济学中挑选出有用的东西来，既需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去深入地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著作和资料，又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敢闯的精神。前怕狼，后怕虎，是不可能利用西方经济学中有用成份的，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们应以坚毅的精神和革命的胆略去清理西方经济学浩如烟海的著作，剖析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如果把西方经济学当作“一所大宅子”，可以借用鲁迅批判“闭关主义”和关于对待文化遗产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鲁迅说：“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进去，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反之，如果“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鲁迅主张“占有，挑选”，“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并且告诫我们，这要“沉着，勇猛，有

辨别，不自私”^⑧。鲁迅的这种立场和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就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在当前，特别需要鲁迅所提倡的那种“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革命精神。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新学科、新学说、新学派层出不穷。它的实用色彩空前地浓厚了。这就是说，当代西方经济学注意研究各种具体的实际的经济问题，为垄断资产阶级加强企业管理、攫取最大限度利润服务，为西方国家政府加强经济干预和经济调节、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这种实用性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它所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程度不同地带有一种合理性或科学性。他们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对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所有这些，都凝结着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利用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合理的部分，不能简单地视为引进资本主义，看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为了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明确指出了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与资本主义并没有本质的联系。他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⑨在南方巡视期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澄清了人们在姓“社”姓“资”上的顾虑，为解放思想，大胆引进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敢于“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⑩；敢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新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看法，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并积极向我国有关经济部门提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存的模式可循，除了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应当借鉴西方经验。因此，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去做，“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显然，吸取西方经济学成就胆子也要大一些。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不少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迅速发展，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前进的步伐。各地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哪里改革开放胆子大一些，哪里建设就搞得更好一些。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抓住有利时机，实事求是，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三

我们在认识到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成果之后，还必须善于借鉴和利用这些成果。我们决不能也不应盲目“引进”，生搬硬套。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危害性。例如，曾经有人热衷于凯恩斯主义的“高消费”政策，企图以此带动生产，繁荣经济，结果出现消费热，奢侈浪费，损害积累；后来又有人搬来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鼓吹“赤字财政有益论”、“温和通货膨胀无害论”，企图用以刺激生产，活跃市场，结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给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必须引以为戒。我们认为，要能真正善于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就，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首先，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成果对我国是否有用，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西方经济学的“高消费论”、“通货膨胀无害论”,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害无益。但是,也有许多是利用得好的,有成功的经验,邓小平同志认为,“三资”企业就是一个利用得好的例子:“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所谓“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这一判断标准,我们必须大胆地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事实表明,在改革开放中的每一次突破,如企业管理改革、物价改革、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各家各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从而使得改革方案最优,失误最小。

其次,实事求是,从我国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⑩这就告诉我们,西方经济学和国外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国内,从中国实际出发,融会贯通地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部分来探讨国内经济问题。

西方经济学和国外经济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相结合,对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一无所知,则这种研究很难深入下去,即使对西方经济学有比较多的了解,也难以使其研究成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如果不了解西方经济学和国外经济情况与经济政策,这种研究也会有很大局限性,不会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目前,这种脱节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某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根本不去了解我国经济情况,另一些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人,又完全不愿懂得西方经济学,这种情况已是非改不可了。

这种相互脱节的情况,西方经济学本身也严重存在。不少西方经济学家热衷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或热衷于把经济理论变成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学游戏。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列昂惕夫在1982年致《科学》杂志的信中就曾指出,在近年的经济学期刊中,数理经济和纯理论性的文章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实践性、政策性的文章。在我国经济学家中也存在这种倾向,食洋不化,值得我们警惕。

最后,在借鉴和吸取西方经济学成果时,要着重于它的实际专门研究。我们知道,在一般理论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受资产阶级利益的限制,不能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敢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般地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实际的专门研究,即在技术、组织等具体经济研究方面,虽然同样受资产阶级利益的限制,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为了替垄断资产阶级谋取最大利润,必需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中有关经济问题,反映经济过程中某些具体的、局部的客观规律性。我们讲借鉴和吸取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指的就是这些方面。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也正是指这些方面。例如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里所说的计划与市场,就是属于具体经济问题,或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属于“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证券、股市”,也属于具体经济问题,是可以利用的。所以他强调

说：“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只是举了几个例子，从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和讨论中，认为下列各学科和方面有可供借鉴和吸取的东西：

1. 西方实用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实用色彩较浓，只要我们善于剔除它们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方面，许多东西是可供借鉴的。

2. 数理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统计分析、投入产出分析都是运用经济数学方法的，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现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重视数学方法、数理统计以及电子计算技术在经济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利用这些成就，是很必要的。

3. 微观经济学。它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规律，研究单个生产者或企业怎样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商品和劳务，以保证最大限度利润；研究单个消费者或家庭怎样利用有限的货币收入购买商品和劳务，以获得最大满足。微观经济学中有关市场机制的理论，如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成本理论等等，是可以借鉴的。

4. 宏观经济学。它研究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活动，研究收入决定、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问题，以及全社会的整体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学关于总需求、总供给、乘数原理、加速原理、社会购买力、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的分析，也是可资参考的。

5.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搜集了大量事实材料，汇编了各种统计资料，这些在西方经济学家及其政府手里，主要是粉饰和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政府出谋划策的依据。但我们可以运用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只要我们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上述各个方面在剔除其糟粕之后，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但是，即使在实际的专门研究方面，在不涉及价值判断，甚至没有阶级性的技术问题方面，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而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特点，有选择地加以利用。

四

我们是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成果的。但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有用了。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恰好相反，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研究好当代西方经济学，才能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什么是应当批判和摒弃的。特别是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可供吸收和借鉴的东西，往往同庸俗的、错误的理论混在一起，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入系统的科学分析，把一切可以借鉴的东西提取出来，加以改造，而不是兼收并蓄，照抄照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等就明确说过：“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社会科学，要准确地把握它，科学地分析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渊源和现有内容有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切忌一知半解和浅尝辄止；二是要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可须臾离开。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

义,我们才能从总体上和实质上把握西方经济学,预测其发展趋势,区分其糟粕和精华。”^⑩

我们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主张借鉴其中的科学成分来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目的还在于进一步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各个阶段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和利用,是不可能创造出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列宁为了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参考了几百种西方经济学书籍、学位论文、小册子和报刊的文章与统计汇编。他对西方经济学文献是非常重视的,既仔细地研究了那些阐明各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的长篇经济著作和历史著作,也认真地阅读了西方报刊上阐述某个问题的小文章。列宁对这些著作不止一次地阅读,从中作了大量的摘录,编了详细大纲,把有用的东西加以引用和吸收。他的《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也正是利用了西方经济学才创立起来的。我们某些经济学教科书,既不注意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变化,也不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显得陈旧不堪。对此读者不感兴趣,是不足为奇的。

毫无疑问,现代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剥削的形式和方法、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垄断组织的形式及其统治方法、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具体表现,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不研究这些变化,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从整个体系的本质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模式,当代西方经济学也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⑪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有人却写出所谓《私有化宣言》,妄图使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可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因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在吸取和借鉴其有用成果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些年来,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敲了警钟,这就是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它也告诉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胆地吸取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事实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背离这条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吧!

注 释:

①②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110页。

④ 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在视察我国南方时的重要讲话,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讲话。

⑤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页。

⑥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7页。

⑦ [英]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⑧⑨⑩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310、371页。

⑪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2—33页。

⑫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1页。

⑬ 《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页。